

中国加入 WTO 的政治意义

□刘军宁

1999年11月15日，中国政府与美国政府签署了两国政府关于中国加入WTO的协议。这使我们有必要再次检讨加入WTO对中国产生的影响。以往，人们从经济方面思考的比较多。然而加入WTO对中国的影响将是全方位的，其中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政治方面的影响。这里试对这种影响作一个初步的评估。

第一 加入WTO将影响到中国政府管理经济的体制。中国加入WTO的背景是外国公司，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大公司大举进入中国的市场。这些公司进入中国之后，一定会把他某国享受到的制度背景和制度环境投射到中国来，对中国也会产生类似的制度要求。这样，他们会对中国政府的政治法律政策，政府职能管理的方式提出自己的要求。西方公司如果大规模进入中国，就一定会要求更加开放、公平的市场环境。

第二 加入WTO后，一个迫切的要求就是在中国实行切实的政企分开，要求政府对所有在中国的企业一视同仁，不能再给国有企业吃小灶。1999年4月份中美两国关于市场准人的备忘录中，美方明确提出要限制政府对经济生活的以往的

那种积极参与。备忘录要求企业在商业的基础上运作，而不是在政府的偏袒下运作。中国政府也在这一方面作出了一些初步的承诺。这些承诺一旦开始兑现，政企合一的体制将面临重大的挑战。这也意味着以国有经济为主导的经济体制将面临空前的压力。

第三 加入WTO要求提高中国政府决策和行为的透明度。多变的政策、含混的手续与规则、灰色的管理和黑箱式的政府采购都将在加入WTO之后面临重大的挑战。前一段时间，许多人一再抨击美国政府1999年4月公布中美两国关于市场准人的备忘录的做法，认为美国的这种做法让中国被动。但是，按照政府行为应该透明的原则，中美两国政府都有义务公布这个备忘录，因为这涉及到本国各自的利益。中国若想走向成熟的市场经济，政府的行为必须透明。

第四 加入WTO后中国必须实行法治。政府行为必须变得让民众可以预测。按照法治的原则，政府做什么事情，必须有一个严格的法律依据。政府的决策过程和政策制定是社会上可以预期的，不能让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使国家向国际

21 世纪世界局势会怎样？

——王逸舟访谈录

〔学者简介〕王逸舟 国际政治学家。主要研究当代国际关系理论、外交和国家战略等课题。有《环球视点》(1999)、《西方国际政治学：历史与理论》(1998)、《当代国际政治析论》(1995)等多部专著 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

法制的规范化迈进。例如，备忘录允许美国在中国开设律师事务所，不再受地区的限制 换句话说 美国的律师事务所可以更多地介入中国的法律事务。而且由于大量的美国公司进入中国，一旦这些公司卷入诉讼程序，将对中国的诉讼程序乃至司法制度形成压力。

第五 加入 WTO 要求中国从结构上消除腐败。一旦中国加入 WTO，美国和西方国家会把中国的商业腐败问题提上议事日程。美国和西方公司一旦大规模进入中国，把他享受的在别国的待遇移植到中国来，就会要求中国政府有效地打击腐败。

第六，一旦加入 WTO，就会对中国部门垄断提出挑战，其中还有更重大的问题，就是一旦中国加入 WTO，大规模的西方公司进入中国，就涉及到外资企业在中国的金融服

所副所长，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

最近，本刊记者就一些国际热点问题采访了王逸舟。

记 在 21 世纪，世界总的大格局会有什么变化，您对“多极化”现

务问题。只要有大量的外国公司进来就不可能不让外资银行进来。届时，金融自由化、人民币自由兑换的压力就会更大。这方面的垄断的破除，其政治后果都将是非常巨大的。

中国加入 WTO 将使中国获得自改革开放以来的最大的外部推动力，它对中国内部的政治生态产生的影响将是持久而重大的。这一举动所蕴含的政治象征意义不言而喻。可以料想，中国的下一目标将是进入八国工业集团。可以认为，加入 WTO 将推动现有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变革。当然，也应当承认 加入 WTO 对中国的上述政治方面的影响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上面的估计大体成立，那么，中国人民从加入 WTO 中所得到的政治收获将远远大于其所带来的经济收获。

(摘自《百科知识》)

象有什么看法？

王 我认为 冷战后 有一个两极向多极世界的转化，但它中间有一个由单极向多极的过渡。展望未来世界的格局，我的总的感觉是：多极化是一个十分漫长的过程，我不把它看成一种完全幻想的东西，但也不看成一个马上能实现的前景。总的看，多极化是一个长远的追求，但我相信它是有希望的，因为我觉得单极世界毕竟是一个霸主世界，是一个以单一的价值体制来规范、约束世界的体制，它总是与我们希望的多极化的追求不相吻合的，世界本来是多样的：文化多样，社会制度多样，发展水平多样，生活方式多样，各个国家传统也不一样。因此，多极化是符合人类世界的追求的。我所说的“极”不单指权力、实力、力量 就像基辛格讲的“力量平衡”更重要的指的是，它反映出的是人性的、文化的丰富多彩性，指的是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生活方式的多样性，它显示出的是一种人类共荣共存的世界，而不是建立在单一文化制度基础之上的，这是一种人类的理想，我认为它是有可能逐步实现的。但目前来看，单极世界的阴影还是非常厚重的，美国由于苏联的瓦解，权力和野心愈加膨胀，所以，这个问题要从两方面看，既要看到问题严峻性，又要看到单极世界的做法违背世界发展潮流，它终将被历史发展所削弱。

记 未来一段时期 单极世界特

点非常突出，是否会导致世界不太平？

王：是这样，至少是不太稳定的格局。例如，我们从科索沃危机中就能悟到一些警示。首先，它可能激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个竞赛首先从美国开始，然后引发了一系列国家纷纷加入，它扭转以往 10 年来军备数字下降的趋势，使各国军队都有一种防患于未然的心理：武器差，就要挨打。一些高精武器、TMD 和 NMD 的研制，使战争的阴影在一些地区更加浓厚了，这是让人担心的。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世界不会太平，人类要遏制军备竞赛，是一个很艰难的过程。

记：大家都说，近一段时间，在中国的周围形成了一个包围圈，您如何看？

王：最好不采用这个说法。有这种心态会影响我们同各国的正常交往，我认为：同各国之间应当是有挑战，也有机遇的关系，我不同意把我们看成处在一个四面楚歌，四面受围的境地。

我们从科索沃危机中得到的另一个警示，就是联合国的作用受到削弱。在这场危机中，联合国被抛到一边，国际法、国际准则被践踏，未来世界中，联合国如果不再起作用了，那么谁起决定作用？美国？北约？有人曾指出北约全球化问题，北约有可能会在全欧得手，然后向中亚、地中海、北非扩张，再对中国施加影响。北约已从一个单纯军

事组织变成一个军事政治组织，这个动向值得我们警惕。

在未来，联合国的作用需要世人的扶持，否则，联合国被践踏，世界上的事务由一些最强的国家说了算，这是很危险的倾向。

记：未来国际社会中，联合国的作用是被增强还是被减弱，您持乐观还是悲观态度？

王：联合国的前途很难说，有两种前景。一种前景是：由于科索沃危机践踏联合国，引起大部分国家的警觉、重视，吸取了一些经验教训，于是会通过做出一些必要的措施增进联合国今后的作用，使它更有活力，各国更能接受。另一种前景，联合国将来的作用仅限于一些不敏感区域，诸如教科文、妇女保护、难民救助，等等，而在国际安全领域，在国际维和行动方面，可能越来越难以发挥作用，这两种前景我看都存在，究竟哪一种会占主导地位，要取决于各个国家的努力，特别是一些主要国家的努力。

关于多极化的问题，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需要注意。这场科索沃危机给世人一个警示：各国间各种文化、各种宗教区域之间需要一个新的磨合过程，过去，大家重视的是政治制度、社会斗争，而民族间、文化间及宗教之间的矛盾很少受到人们关注，而现在这个问题显化了。各民族的文化及文明矛盾应当是既有冲突又有融合。东亚地区这个矛盾处理得就不错。未来的多极世界，

应当建立在不同文化、不同文明基础上，大家共同繁荣，互相学习，这样才是比较好的世界格局。

记：过去的一年里，局部战争不断，在 21 世纪，危机和热点地区是否会有变化？

王：未来一段时期，我想是既有冲突又有合作，既有地区性战乱也有世界经济的发展。关于冲突的分布，这几年我一直在讲一个看法，我认为，它不是全球性的，不是核大战，而主要存在于一些缝隙地带。由于一些大板块的挤压而产生的缝隙地带，如前苏联、东欧解体了，解体之后产生一些很小的破碎国家，地理学上叫小国林立的破碎地带，如高加索、巴尔干……，它们在政治地图上总呈现着动荡不定的势态。它们普遍具有民族矛盾、宗教矛盾和各种地区隔阂。再有，南亚地区也一样，各种宗教、种性民族都存在差异、矛盾，政府与游击队之间，国家之间，如克什米尔。

记：您所指出的挤压缝隙地带的含义是什么？

王：首先是地理上的挤压，但更重要的是反映出社会发展、文化文明的差异。体现着发达与落后之间的冲突、碰撞，不同意识形态、不同文化、民族矛盾的激烈冲突。这些地区，人口是全球最稠密的，是矛盾、麻烦潜质比较高的地区，这些地区近年来还掌握了一定的核武器。另外，还有一个冲突的“弧带”。就是从北非到西亚，中东以至中亚，从

地图上可看到一个弯弯的，新月形的地域区，它的主要问题是文化转型还未完成，它有传统的观念、文化和相对落后的经济环境，它在同邻近的现代、西方国家磨擦、碰撞中，产生矛盾。如中东与以色列，以色列很小，但受西方国家扶持，现代化程度较高，阿拉伯国家却相对落后，所以，在矛盾磨擦的无助无望中，很容易产生冲突对立甚至恐怖主义这一带很多国家都有这个问题，如阿富汗、塔吉克斯坦。所以，从分布来说，的确存在着一个狭长的缝隙地带，它存在于大陆与大陆之间，有的在三大陆交接处，有的是洲与洲板块之间。

记是不是可以这样说 在世界各大洲中，有的洲就不易存在矛盾冲突，而有的地带，有的种族之间，就易存在矛盾冲突？

王：是有这个问题。像非洲这个地区本身处在挤压缝隙地带，同时又受到发达板块的钳制、压迫，如北非、地中海一带，它与发达国家距离较近，之间的矛盾冲突就较直接明显，但非洲又相对独立，对整个世界经济影响不大。我们观看整个世界，可见世界经济分为三大板块：它们是西欧板块、北美板块、亚太板块。它们占了世界经济发展力量的70%~80%，而且这些地区基本上没有战争，或者说战争处在一种可控制状态。如印尼，一旦发生动荡，周围几个国家纷纷前来协助解决矛盾；柬埔寨也一样，朝鲜半岛也一

样，虽紧张，但没打起来，因为美、中、日都不希望那里发生战争。

而在那些缝隙挤压地区，那里的政治经济作用相对世界经济发展而言，处于次要地区，所以从全球看，战争冲突与危机的确存在于一些地区，但不可视为全球性危机。从全球看，世界发展的主流仍然是各国的合作与发展。所以，对此要有一种辩证的眼光。

科索沃危机的另一个教训，是发展中国家自身存在着问题。我觉得一些发展中国家由于自身有着不可推卸的问题，才使国际干涉主义有可乘之机。这次北约给南联盟的打击，一方面是北约的新战略系统扩张的体现，向俄罗斯边界推进了1000多公里；这是外部因素，但是，应看到，南斯拉夫米洛舍维奇政权自身有责任，他们民族政策、民族矛盾解决不好，政权有腐败现象，社会关系紧张，造成南斯拉夫反对党、民众的反对。印尼也如此，苏哈托政权只重经济发展，忽略了民族关系，忽略了政治体制的改革。所以从发展中国家来看，他们的发展，不仅要受到国际保护、联合国的保护，更重要的是其自身要具有一种健康向上的、符合时代特点的体制，要注重改革和现代化。目前，总在讲安全问题，军事安全、经济安全、信息安全，等等，但我觉得这只是第一层面的现象，更重要的是第二层面上的即体制上的安全，不仅防范别人，而且整个社会上下是否团结一致，民族

矛盾是否解决得好。也就是说：国家安全与社会安全不可分，像俄罗斯目前就没有解决好这个问题。第三层含义是国与国之间的安全。邻国的安全对你也有好处。所以为什么亚洲金融危机中，人民币不贬值，而且支援邻近国家 40 多亿美元，这一切除了自身的考虑外，也总结出了对别人有益也会对自己有益的道理。环境恶化、污染、水资源等问题也是如此，它们是这种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问题，世界发展到今日，已很少有一个国家的问题可独立于世界之外。

记：在 21 世纪，您认为中国面对世界应采取怎样的国际态度？

王：中国已改革开放 20 年，取得了巨大成就，一方面是国内的种种努力，另一方面，就在于加强了面向全球的与各国各层次的友好交往。因此，现在面对这种复杂多变，既有机遇又有挑战的国际格局，中国的外交、国际态度与观念都应有一个更高立足点，更长远的考虑。我最近写了一篇文章，叫做《面向 21 世纪的中国外交》，曾系统地谈了这个问题，其中有这样几个基本观点：

中国在面临 21 世纪外交事务中，会遇到这样三方面的挑战：一是发展问题。中国外交需要更好地保障中国社会的发展、稳定和中国政治的变革，即要看中国的外交工作能不能为国内建造一个相对和平稳定，有利于自身发展的环境。中国

过去 200 年一直动荡不安，好不容易有最近 20 年的改革发展机会，不能再争取它至少 20 年，使我们建设成为民主繁荣的、法制健全的、综合国力达到世界先进水平的国家。所以我们 21 世纪外交的首要工作就是要为国内创造一个适宜稳定发展的外部环境，要吸引外资，同发达国家搞好关系，也需要世界上的华人来华投资。同时，出现一些邻邦之间纠纷时，要积极努力地去“灭火”，使之稳定。第二个是主权问题。中国是一个有着 15 个边界邻国的国家，中国还有 9 个非边界邻国，如日本、韩国。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同其中的 10 个国家存在着这样那样的领土、边界、领海、岛屿等纠纷。我们内部 50 多个民族中有的民族如朝鲜族、哈萨克族、俄罗斯族又同境外的民族有血缘关系。如果边界矛盾、主权关系解决不好，势必影响到内部的问题。想想 60 年代在西北有些少数民族就越境他迁了。所以，如何能够在搞现代化同时，解决好民族团结、领土完整、社会稳定、祖国统一的问题也是一个 21 世纪中国外交的大事。面临这样一种复杂的形势：多民族国家、多邻国接壤，有诸多领土矛盾，等等，就使得我们捍卫国家主权，维护领土完整、逐步实现国家统一的任务特别严峻，特别突出。对政治家、军事家、外交家来说，在 21 世纪里都是严峻的挑战。另外一个挑战是责任问题。随着中国综合实

力的逐步增强，随着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地区事务中引人注目地崛起，目前有种种不了解、猜测或担心的观念在一些国家中产生。国际上一些别有用心的人在叫嚣“中国威胁论”，对此，中国就面临如何在国际舞台、地区事务中发挥自己建设性作用的问题，树立负责任大国的形象，逐渐地把我们的观点和实际情况让外部世界更好地了解。所以，可以说这是一种“责任意识”的培养，这种“责任意识”再加上前面两个复杂方面的挑战，就形成了一个错综复杂的局面。

中国的 21 世纪外交就要在这三者矛盾交错的关系中找到最佳的矛盾平衡点，这种平衡点不是静止不变的，而是不断运动变化着的，这是一种动态平衡。寻找这种最佳平衡点并谋求尽量快速的发展，是 21 世纪中国的政治家们、军事家及外交家们面临的极其严峻的挑战。因为在全球一体化、信息化社会的今天，讲求发展已不是单一的事了，我们不仅要搞好经济发展，又要考虑周边关系，防止领土被割裂，还要顾及国际形象。种种问题之间，需要我们做这种动态的协调。

记 您对中国加入 WTO 问题怎么看？

王 加入 WTO 是大势所趋，中国需要加入 WTO，世界也需要中国加入，但我觉得加入 WTO 一定要按照中国自身经济发展的日程表解决这个问题，如发展速度，政治、

经济体制改革的日程，中国的具体国情等。决不应按照外部世界的日程表和条件去加入 WTO 这对中国这样一个急待发展的大国家来说弊大于利。我们可以逐步调整一些加入条件，但万不可一味地去适应国外的要求，而忽略了自身的国情和条件。

另一方面，我希望人们也不要对加入 WTO 后抱有一种一劳永逸的看法，我国在加入后，也会同各个方面有许多磨擦，许多具体的协定和条件要一项项地去落实和解决，逐步使我国在加入 WTO 后迎来一种利大于弊的经济发展形势。总体上看，人世将给中国带来重大的推动，这不仅指经贸方面，而且有政治、社会和对外关系的含义，中国将更加密不可分地与世界融为一体。

记：您对台湾问题怎么看？和平解决的前景是否存在？未来一段时间双方关系是缓和还是进一步恶化？

王：我们目前应当用更加理性、成熟的方法来对待两岸关系。我 1999 年 6 月去过台湾，李登辉 2000 年 3 月就面临总统竞选了，所以他想方设法给后人留一些政治遗产，有时不惜用一些冒险的手段、挑衅的方式，以实现当“建国之父”的野心。我们不能放弃在必要时使用武力的主张，对台湾没有这个压力是不行的；但另一方面，双方的对话应当针对不同时机使用富有弹性、灵活的办法，让台湾同胞觉得大陆

经济全球化 的代价

□张礼卿

“经济全球化”给各国带来经济利益，同时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一——全球经济的不稳定将成为一种常态。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各国经济的相互依赖性空前加强。不少国家的对外贸易依存度已超过30%，个别国家则达到了50%—60%。在这种环境下，经济波动和危机的国际传染便成为经常性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任何一个国家的内部失衡都会反映成为外部失衡，进而很快影响到与其具有紧密贸易和投资

给了他们一个很大的余地，我不希望看见海峡两岸兵戎相见，炎黄子孙互相残杀的现象。但目前我对李登辉的所作所为不抱什么幻想，好在他在任时间已不长了，希望下届台湾的领导人能 与大陆有更加良好的接触与对话，如此便会有新的机会，我们也会对祖国统一问题在制度的灵活多样上做出更有弹性的安排，让台湾民众觉得对他们有利、可行。我认为大陆与台湾的和平解决前景是光明的，祖国统一的大业终会实现。并不见得统一时间拖得长

关系的国家，最后极有可能将所有国家不同程度地引入失衡与危机的境地。1997年泰国的汇率危机很快传染到整个东南亚地区以及韩国和日本，从而形成严重的地区性金融危机，随后又波及俄罗斯和拉美地区，形成了全球性金融动荡。

国际游资的存在肯定是全球经济不稳定的重要根源之一。作为一种超越国界的巨大的金融力量，国际游资一次又一次地扮演了全球性金融动荡的制造者或推动者，扮演了危机传染的主要媒介物。60年代的美元危机，70年代初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瓦解，80年代初的拉美债务危机，90年代初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汇率危机，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每次都令人震惊地表现了国际游资的巨大破坏力。自60年代起，尽管各国经济学家们一直在探索对国际游资实

些就对大陆不利，恰恰相反，只要双方不打仗，双方愈拖下去对大陆愈有利：大陆人口是台湾的60倍，面积是台湾岛的300倍，若干年后大陆经济发展得更加繁荣，政治民主化、法制化建设、文化建设越加提高，我们祖国与世界各国的交流更加广泛，全世界也会更加看重大陆这个广大的市场，更愿与我们进行友好交往，这对台湾回到祖国怀抱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对此我们要有足够的信心。

（摘自《百科知识》）

施控制和监管的方法，许多深受游资冲击之苦的国家也曾努力加强资本管制。但总体而言，这些探索和努力收效并不明显。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在于，在全球经济、贸易发展迅速一体化的环境下，资本管制的有效性正在不断下降，国际游资可以利用各种渠道方便地绕过或躲避资本管制。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二：各国经济主权的独立性正面临日益严峻的考验。欧盟经济体发展的历程表明，随着一体化程度的逐步提高，各成员国经济主权独立性则不断下降。从早期的关税同盟，统一农产品价格，汇率联合浮动，到单一货币欧元出现以后的统一金融政策（1991年1月欧元区启动），无不说明各成员国的财税和货币主权已逐渐让渡给超国界的欧盟协调机制。而这种经济主权的让渡曾使许多成员国付出不小的代价，甚至多次危及欧盟经济体的存亡。

对于欧盟以外的世界其他国家来说，在经济全球化的过程中，其经济主权（特别是在财税和货币政策方面）的独立性，同样面临越来越严峻的考验。这种考验大致有两种不同的形式。一种是经济主权的主动让渡。从关贸总协定（现为世界贸易组织）的历次减税和贸易自由化谈判，到发生金融危机的国家为了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援助被迫进行的经济调整，都是一定程度上的主权主动让渡。总体而言，这种

让渡对于有关国家来说是有利的，因为它们能够从中得到期望的各种回报。另一种是跨国私人经济力量对经济主权的侵蚀。其最为典型的例子就是跨国公司。由于跨国公司的战略目标很少会同东道国的经济发展目标完全一致，因而它们对于东道国为了实现既定的发展目标采取的许多政策措施经常表现出一种本能的抵抗和规避。利用转移定价（Transfer Pricing）进行合法避税已为世人熟知，通过这种手段或其他渠道在国际间进行大规模资金转移对东道国货币金融政策的消极作用同样难以让人忽视。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在汇率动荡时期，跨国企业常常是大规模货币投机的主要责任者。显然，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大量利用外国直接投资的国家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应当引起人们高度重视。

自90年代初以来，随着各国资本账户的逐渐开放，不少国家（特别是新兴市场国家）的货币政策独立性受到严重挑战。在资本流动日益自由化的形势下，这些国家感到了保持货币政策独立性和维持汇率稳定之间的激烈冲突，同时也深深感受到了保持货币独立性的艰难和巨大代价。1992—1993年导致英镑退出欧洲汇率机制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1994年的墨西哥比索危机、1997年的泰国汇率危机，以及巴西汇率动荡，十分清楚地表明了这种冲突和由此产生的连带反应。在上述危

机过程中，几乎每个国家最终都勉强保持了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但同时在汇率动荡方面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事实上，对于在资本自由流动条件下一国能否保持货币政策的独立性这个问题，早就有人做过堪称经典性的论述。60年代初，J. Marcus Fleming 和 Robert Mundell 曾在各自的论文中先后谈到，资本完全流动的条件下，一国将面临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两者之间的明显矛盾。他们认为，一国政府最多只能同时实现下列三项目标中的两项——完全的资本流动性、货币政策独立性和固定汇率制。

上述结论被后人称为“蒙代尔三角”。这个分析框架清楚地显示，在经济全球化过程中，由于资本的自由流动不可避免地会成为一种基本经济现象，因此，一国要想保持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汇率的稳定，必须在一定程度上向跨国私人资本让渡货币主权，或者必须以汇率的经常性动荡换取货币主权的独立。

经济全球化的代价之三：全球范围内的贫富差距正进一步扩大。如前所述，经济全球化本质上是一个全球范围内的市场化过程。这个过程中，竞争创造了效率，同时也使财富越来越向少数国家或少数利益集团集中，导致贫富差距的扩大。据世界银行统计，1983年低收入发

展国家的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为高收入发达工业化国家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 2.4%，即后者等于前者的 43 倍；到了 1994 年，这一比例降低为 1.6%，即后者为前者的 62 倍。造成这种差距扩大的具体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有两个因素不容忽视。其一，是经济全球化的利益分配不均衡。虽然我们已经说明，几乎所有参与全球化过程的国家在不同程度上从中受益，但并不意味着利益均沾。因为事实上，作为资本和先进技术的主要拥有者，发达国家总是处于全球化的中心地位。这种相对优势使它们在价格制定方面具有主导权，不可避免地会使它们在与处于边缘地位、作为劳动主要拥有者的发展中国家进行交换时获得更多的利益。其二，是名义汇率下降导致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的减少。在过去 10 多年里，由于种种原因，许多发展中国家的名义汇率出现了不少程度的下降。在一些发生危机的国家，货币的名义贬值自然使国民生产总值的名义值减少。如 1997 年东南亚金融危机中泰国、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高达 20% ~ 50% 的货币名义贬值，就使它们的国民生产总值名义值倒退了 10 年。况且，由名义贬值引起的实际贬值又将导致贸易条件的恶化，进而在国际交换中付出更大的代价。

（摘自《世界经济》）

浦东：警惕金融泡沫

□张华侨

每平方米 4000 美元

站在 88 层高的金茂大厦上遥望，浦东尽收眼底，这是当今中国最高的大厦，它每平方米的售价是 4000 美元（3 万多元人民币），从这昂贵的售价中似乎透露出，这里必须要有一幢足以反映其繁荣及影响力的大厦，而金茂大厦正想扮演这一“角色”，并为今日上海乃至中国树立一个新“典范”。

尽管这幢大厦自称没有其他物业可媲美，但它却并不能代表真正企业家的精神，因为它是某一部委所属公司，通过调集几亿美元堆砌而成。而这几亿美元又从何而来呢？事实上这幢大厦并没有达到当初决策者所预想的效果，大部分处于空置，还在等待所谓的外商来租或购买。

在陆家嘴金融贸易区，像金茂大厦这样空置的高档楼房还很多。一幢 39 层的大楼，目前只有 3 家单位租用，该大楼曾寄希望于知名的跨国公司、保险、证券、银行等机构前来租用，可现在的情况远远不是当初所设想的那样美好，如果在 1999 年达到 10~20% 的出租率那也很了不起。

据不完全统计，浦东高档写字楼的空置率约 40%。与高峰时期相比，投机于房地产的热潮正在减退。在房地产超前发展时期，房地产价格是在强劲的利驱动下上涨起来的。在楼房多次换手后，获利的投机者已将资金抽走，而最后的业主也作短期打算，靠国际商业银行和国内金融机构高息融资。

为了支付高昂的开发成本，投机者喊出 4000 美元 1 平方米的天价，也就不足为怪了。并且希望这么高的楼价，让外商来购买，然而要实现这一梦想，现在似乎还很遥远。

由于全球经济发展对资金需求增加，使全球资金供应紧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相互争夺资金日趋激烈，特别是受金融危机冲击，使亚洲一些国家对上海的投资减少。

在影响浦东利用外资的同时，也间接地影响了外商对中、高档办公楼的需求，使投机者曾寄希望于外商购买高档楼的愿望变得飘渺。

金融投机产生金融泡沫

由于当初开发浦东，兴建基础设施需要大量资金，而浦东一下子难以拿出这么多的资金，于是就成立了四个官办公司：陆家嘴、外高

桥、金桥、张江。

浦东先是把土地批给这几个公司，然后这些公司把地开发成熟地，再批租给开发商，这就等于这四个公司通过批租土地赚钱来承担政府兴建基础设施的功能，这是起步阶段的必要之举。

但进入浦东的一些开发商却怀着投机心理，有的并不急于在批租到的土地上建楼房，而是以炒卖楼花等方式，转给其他开发商，在开发商的相互转让中，楼价被迅速抬高，大家都相信预期的回报很高，而政府在宏观调控上力度也不够，偏好超前发展，目的是让更多的开发商进来。

在对浦东超前发展的一片赞扬声中，人们相信了它的表面繁荣，可等到高楼真正建成之后，其楼价已超过了当初十几倍，而开发商认为高价楼盘的承受者是外商。

但是在亚洲金融危机后，亚洲很多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相继破产，被迫进行结构调整，无力再向浦东投资，而房地产开发需要巨额资金，其资金来源的重要渠道是银行贷款，一旦开发商从银行贷不到款，就可能使某个项目发生信用危机。

由此可见，房地产开发商到期不能偿还银行巨额债务，将直接冲击金融机构，从而使金融泡沫暴露出来。

金融功能被扭曲

由于金融机构涉足房地产，追

求短期利益，使本应投向正常投资项目企业的贷款被占用，这就使得进入浦东投资的企业，而临贷款成本高，且难以贷到款。

在浦东的开发过程中，金融机构应该理性地引导资本优化配置，可是一些金融机构被动地跟着房地产投机者走，以为房地产价格上涨，其金融资产也将扩大。

尽管开发商以地产向银行作抵押，以取得银行的贷款，但在房地产泡沫破灭，楼价下跌出售困难的情况下，开发商就很难向银行还清债务，而银行的资金被套在地产里，其风险也就转移到金融机构。

如果银行拍卖抵押的房产，那么将导致房产价格下跌，银行的资产也将缩小，其获得高额回报的愿望也将落空，而由坏账产生的风险也将向银行压来，其结果是导致金融泡沫的破灭。很显然，金融机构这种投机行为，不但推动了浦东房地产泡沫的形成，加大了对浦东投资的风险，而且金融功能被极大扭曲，这与浦东要成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是背道而驰的。

从摩天大楼看金融危机

当 88 层高的金茂大厦在上海浦东建成，并成为当今中国第一高楼时，人们为之惊叹，这似乎是在代表上海的经济繁荣与影响力。

然而人们不要忘记，全球最高建筑一旦向高空突破，金融市场的危机也随之发生，本世纪共有 4 场

金融风暴发生，每一次金融风暴的出现都和全球最高建筑的产生有着奇特的关系。

1908年至1909年，美国纽约新加大厦和都会人寿大厦相继落成，美国银行危机也在这期间席卷全美国，导致数百家中小银行倒闭。

从1929年至1931年前后，有3座全球最高建筑在纽约地面上升起，华尔街40号大厦、克莱斯勒大厦、帝国大厦，一栋比一栋高，刚好在这期间，纽约股市地裂山崩，更多美国银行陷入危机。一场传播全球的经济大恐慌随之登场，给资本主义的体制带来了巨大的冲击。

1973年至1975年，纽约世界贸易中心与芝加哥的西尔斯塔，先后荣获全球最高建筑美誉，为美国增添光彩。可在这期间，全球石油危机不幸发生，美元在全球的威信，也随着美元与黄金脱钩而一落千丈。

马来西亚双峰塔在1997年落成，两座高达1483英尺的冲天巨塔，立即超过了保持全球最高建筑记录长达20多年的西尔斯塔，而在同一年，马来西亚遭到了金融危机的冲击。

很显然，上述危机已说明摩天大楼并不能代表是一种经济繁荣，它反倒可能是一种过度的投机带来的恶果。

而在浦东从事高层建筑的开发，大部分是各部委、各省市政府所属的公司，这些公司凭借政府背景，拥有特殊优势，从而调动巨额资金，

进入浦东搞投机性的开发，他们的到来似乎加快了浦东的开发。

一些垄断性的行业也在浦东进行投机性的开发，如上海某部门联合中国各省市30多个电信局，共同投资5亿元，在浦东兴建一个大酒店，这个酒店的董事长又由该部门的局长担任，形成了一个靠权力垄断国有资本经营，并在内部分享财富的利益集团。

类似电信局这样的垄断行业在浦东搞投机经营的还很多，大多数是由主管部门的某一个领导来出任所属公司的董事长或总经理，直接控制公司的经营，并根据权力大小来进行利益分配。

问题在于，这类公司并不是严格意义上的独立法人企业，也就不可能产生一种企业家的开拓、创新精神，其资产的经营风险、盈利也就无人真正负责，而大量的国有资产又是这样被少数特权者占有、调动、支配，其结果是破坏了整个市场的公平竞争，造成财富被少数人占有，整个社会不公平的现象也就愈演愈烈。

当中国亟需要向市场经济迈进，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时，在另一方面，大量的官办公司通过对资本的垄断，进而垄断市场。最耐人思索的是，高档办公楼越高的建筑，也就有越大的权力在背后支撑。

从浦东一幢比一幢高的大楼中，我们似乎看到了垄断资本的巨大力量，看到了财富是怎样被少数

特权者占有，同时也仿佛感受到浦东在金融泡沫中喘息。

因为以权力为背景组成的公司，在浦东的开发中，是一种非效率的行为，它造成资金的不合理流动，造成不公平的竞争，资源不公平的占有，收益不公平的获取，最终由房地产泡沫来形成金融泡沫，并阻碍整个浦东的发展。

从浦东向国际化迈进的过程来看，仅仅依靠跨国公司来投资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有大量的中小企业进来，其中一个重要的功能是，浦东要在高科技产业上追赶世界，而发展高科技产业需要一个良好的资本市场来引导创业者进行风险投资。只有这样，浦东的产业才更具有竞争力，经济发展才更稳定。

因此，浦东的金融机构应具有更强的独立性与创新能力，以此来引导资源优化配置，决不让金融泡沫来危害浦东的持续发展。

未雨绸缪

浦东的隐患已引起浦东新区管委会的警惕。管委会日前宣布了一系列新的政策措施，包括简化审批手续、设立科技创业投资基金、推出企业注册直接登记制以及扩大市场开放，推进浦东新一轮开发建设等。

在《财富》论坛年会后许多外商更看好浦东。日本东芝公司总裁在年会期间考察浦东时，就表明了投资浦东的意向，他回国后立即召开董事会议介绍上海浦东的情况，

董事会当天就通过了投资浦东的决策。已落户浦东的外资企业也加快了“梅开二度”的步伐。

与外资涌入相对应，全国各地投资上海浦东的热情再度高涨。据统计，1999年9月份至今，各地投资浦东的新增项目达96个，注册资本6.74亿元。进入上海的国内企业集团有三分之二落户浦东，大大超过年初设定的目标。

而在投机色彩浓厚的高档写字楼退潮时，浦东的商品房销售开始掀起高潮。浦东开始涌动新一轮投资热潮，它对消除地产泡沫、金融泡沫无疑会提供极大帮助。

（摘自《南风窗》）

困 境

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到处是一片废墟。有两个美国人去访问一户住在地下室里的德国居民。离开那里之后，两人作了如下对话。

甲：你看他们能重建家园吗？

乙：一定能。

甲：你为什么回答得这么肯定呢？

乙：你看到他们在地下室的桌上放着什么呢？

甲：一瓶鲜花。

乙：对，任何一个民族，处在这样困苦的境地，还没忘记美，那就一定能在废墟上重建家园。

（摘自《现代女报》）

全球性衰退将会到来？

——美国的海市蜃楼与世界经济危机

□周立

当世界从近几年的金融危机中刚刚趋于平静，保罗·克鲁格曼这位自称有“危机癖”的专家在接受美国《领导者》杂志采访时，对短期内的世界经济形势表示悲观（虽然他表示最终趋势“仍然看好”）因为“我们处在一个必须时刻系紧安全带的世界经济中”。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多恩布施也认为当前世界经济至少要面对两大难点：美国股市价格和日本债券价格。尤其是美国的股市泡沫已聚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泡沫，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危险。

最大的泡沫与最后的崩溃

1995年初，美国的道琼斯指数只是刚刚超过3000点而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全球股市一片哀鸿之时，美国经济却一枝独秀，股价一路飘红，1999年3月29日道琼斯股指过万点大关后，35天后竟又再涨1000点，此后便高居不下。有人统计道琼斯指数由80年来的每年涨十来点，20年来的每年涨百来点，加快到近两三年的每年涨千来点，直到1999年的一个多月就涨了1000点，股指上涨呈急剧加速之势。早在1996年，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就指出美国股市为“非理性的

狂热”；1998年英国《经济学家》也以封面专题警告世人巴菲特、索罗斯等投资家也不停提出警告，但美国股市却依然牛气冲天，让世人大跌眼镜！据统计，1990年以来美国经济年增长率为3%企业赢利增长率为10%而股价则以17%的高速度上冲。从股市脱离经济增长率和企业赢利增长率来看，其中的泡沫成分显而易见。美国经济是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美国的股市泡沫也成了当前世界上最大的经济泡沫。而且让人更加不解的是这两年持续亏损的亚马逊（amazon.com）、美国在线（AOL）、电子海湾（ebay）等所谓网络股一路领涨，市盈率高得令人咋舌，成为一枝独秀的美国股市中的“秀中之秀”。这些缺乏实际业绩支撑的股票未知是否会成为戳破股市泡沫的金针？日本许多经济学家说，美国现在的经济状况和日本泡沫经济崩溃前的情况是一样的，但美国经济和美国股市还能表现得那么好实在是出人意料。从事股票交易的行家也说，如果连擦皮鞋的人都在谈论股市，那股市就快崩了，而现在的美国，连擦皮鞋的人都已经炒起了股票，股市却一直没有崩溃，美国股市是靠什么来支撑的呢？

谁来戳破这个大泡沫？

支撑美国股市上扬的不外乎三大因素：外来投资、过度消费和网络经济。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最有可能戳破股市泡沫也正是这三大因素的逆转。

（一）外来投资：“资金难民”必将回流

诸多证据显示：美国股市的高涨是以其他地区的危机为代价的。1994年以来，墨西哥、东南亚诸国、韩国、日本、俄罗斯以及巴西等国家和地区危机的相继爆发使得7.2万亿美元的国际游资除美国和欧洲外几无存身之地，而欧洲统一货币进程中的风险以及科索沃局势的持续动荡使资金在欧洲也不能安宁。正是这种动荡的国际局势，使美国几年来一直享受着来自世界各地的廉价货品，接纳着来自危机各国的“资金难民”。

亚洲金融危机爆发不到一年，亚洲地区约有7000亿美元的资金流向美国。而更早些，在欧洲统一货币过程中，欧洲财富持有者为了躲避统一货币风险，把大量的欧洲货币兑换成美元并大量收购美元资产，造成巨大的货币环流从欧洲流向美国。据专家估算，约有7~8万亿美元欧洲财富流向美国。对于市值达12万亿美元的庞大美国股市来说，这是个不小的数字。所以，美国股市的平均市盈率在1995年以后出现异常走高现象，也就不难理解。

实际上，美国的投资环境理论上并非十分理想，美元贬值的风险也十分之大，在1971年至去年的28年间其中26年都是美国的贸易赤字年。按照经济学原理，巨额贸易赤字带来的应是本币信誉受损，导致本币贬值，从而引发本国经济危机。但美国却是一个例外，在巨额贸易逆差的背景下，美元却成了当今世界上币值最坚挺的硬通货，无非靠的是其独步天下的国际地位。一旦欧元、日元等币值稳定下来，“资金难民”返回“家园”美元的贬值风险便会释放。

1999年的形势显示，日本经济开始走强，韩国、泰国等亚洲国家经济均转为正增长，德国经济也在走出谷底。英国《经济学家》预测欧元11国明年经济增长将与美国接近，约为2.6%……这使得国际资本流向开始发生转变。伴随世界各地危机的渐渐平复，从“高处不胜寒”的美国股市获利套现势将成为一种风潮。外来资金一旦撤出，美国股市便有急挫的风险。

近些年发展起来的金融结构也越来越经不起资金流出入的影响。金融交易的杠杆化使得融资越来越便利，融资额越来越大，金融资产的证券化使流动性大大增强。这样，资本市场的一点异动便往往会带来可怕的“羊群效应”，使资本市场瞬间处于过强的买压卖压之中。这些通过巧妙安排的金融制度在 market 形势平稳时有很高的金融效率，

但一旦出现恐慌，大家都想出售某种资产时，灾难就来临了。1998年9月美国长期资本管理基金(LTCM)的危机就源自俄罗斯政局动荡而引发的整个金融体系的信心危机，各个投资者都在“杀价大出血”，使得LTCM的巨额资产一下子化为乌有，幸亏美联储及时进行了减息才使市场恢复了平静；但美联储的官员明白：这次他们只是躲过了射来的子弹，狙击手却依然在那里。短期资本纷纷逃来美国时，会带来灾难，逃离美国时，同样也会带来灾难。

(二) 过度消费：寅吃卯粮能持久久？

庞大而持续增长的消费可謂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一大原动力。1998年，美国居民消费支出增长了约5.7%，这是14年来的最快记录，从而使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到了85%。有一种观点认为，美国靠生产得更多而在二战中打败了德国和日本，靠消费得更多而在冷战中打败了苏联。支撑美国经济的消费增长能否持续下去呢？我们首先要看一下消费的增长是怎么来的。消费的增长来源于三大因素：一是随股市高涨而获得的资本利益，从而引起财富效应。一般认为，以股票表现的财富每增加100美元，消费便会增加2~4美元。二是工资整体水平的提高。三是消费者对未来的预期。近两年美国消费增长主要来源于股市飙升。1995年以来股市的上涨已使美国的家庭金融财

富增长了两倍以上，1998年在美国公司赢利大幅度下滑的背景下，道琼斯指数仍提高了20.7%，1997~1998年两年美国居民的财产因股价上涨而增加了3.1万亿美元，由此而带来了消费者对未来的乐观预期，加重了美国居民本来就有的寅吃卯粮的消费心理，致使家庭储蓄率一降再降。1995年美国的家庭储蓄率为6.8%，1997年下降到3.8%，1998年10月竟出现了第一次负值，达到-0.02%；1999年3月则进一步下降到-0.6%。这意味着，美国人不仅放心地把当期收入全部花光，未来的钱也拿来照花不误。美国居民为何这么敢于花钱呢？靠的是对未来的信心。这种信心又源自何处呢？主要是来自股市泡沫，来自于对新经济创造的新神话的坚信不疑。实际上，与庞大的消费支出相比，美国居民的个人收入增长率却达到了近年来的最低点(1998年为5%)也就是说，消费增长和可支配收入增长是完全脱节的。

(三) 网络经济：新经济的新神话

70年代以来，美国靠发展IT产业而在当今成为信息产业的主导者。新经济也以其独特经济特征向传统经济规则发起了强大挑战。正是由于这些特征，使美国人对新经济能带来不可思议的新财富的神话深信不疑，这使得新经济的代表——网络股票身价倍增。